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表现、原因和启示

王效云

【内容提要】 塑造经济韧性的路径是多样化的，但任何一条路径都离不开结构性因素。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来说，存在四条强化路径，其中不过多依赖旅游业是各条路径共同的前因条件。此外，较高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较高的技术水平以及不过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都是塑造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而较高的财政缓冲也有助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提高经济的韧性。本文采用核心变量法，对中东欧16个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韧性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和衡量，根据测度结果，将这些国家划分到七组情景。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经济韧性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机制和渠道，选取六个可能的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塑造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的条件组态进行分析。

【关键词】 经济韧性 中东欧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作者简介】 王效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

DOI:10.20018/j.cnki.reecas.2022.05.008

引言

经济增长与波动是宏观经济学两大永恒的主题。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是各国宏观经济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受内生的经济周期性因素以及政策、技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外生冲击的影响，经济增长常常会偏离既定轨道，表现出程度各异的波动性。传统上对经济增长波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而对外生冲击的研究重视不够。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工

业化进程的深入，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因政策调整、极端气候、地质灾害、疫情等导致的“黑天鹅”事件频发，极大地危害了各国经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使世界经济陷入了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促使人们开始将观察视角更多转向与冲击相关的经济韧性和脆弱性方面。

经济韧性的强弱决定了受冲击后经济是“成功复苏并稳步增长”还是“一蹶不振持续下行”，关注经济韧性的初衷是探索如何实现经济稳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①。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2021年4月份的一段讲话中所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多强大，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薄弱环节有多么脆弱。她进而呼吁各国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经济韧性和脆弱性也成为决策层非常关注和学术界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没有消退的迹象，中美对抗性竞争持续升级，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愈发严重，由此激发的世界格局重塑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增强经济韧性，对实现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的意义尤为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异质的，从中能够看到各国经济不同的韧性程度和脆弱性表现。本文将衡量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各国的经济韧性程度，识别导致或者阻碍各国获得高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得到关于提升疫情下我国经济韧性的启示^②。

一 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布拉蒂安、帕帕斯和格利普图等所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对政府政策、卫生系统、企业行为、个人行为 and 决策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③。全球各经济体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普遍出现经济增速的下滑和经济秩序的紊乱，但疫情对

① 王永贵、高佳：《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载《经济管理》2020年第5期。

② 中东欧各国具体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黑，共16个国家。

③ C. Bratianu,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VID-19 Crisi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Management & Marketing, Challenges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 2020, No. 15 (Special Issue), pp. 410-423; N. Pappas & K. Glyptou, “Accommodation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mplexity Insights from Gre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February 2021. <https://doi.org/10.1016/j.ijhm.2020.102767>

各个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表现相当脆弱，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因而哪些因素可以使得经济体面对疫情或其他冲击时更具有韧性，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谓韧性，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源自拉丁文 *resilire*，意为“反弹”^①。1625 年培根在其著作中首次使用了英文 *resilience* 一词。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韧性的概念开始广泛应用于力学领域，代表物体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物体的韧性越好，则其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②。1973 年美国生态学家霍林将韧性引入生态学，将其称为系统吸收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持续存在的能力^③。自此之后韧性概念开始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化韧性等多维视角下的韧性概念和分析框架应运而生^④。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与韧性直接相关的理论，雷贾尼、藤田和蒂斯是较早把韧性引入空间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学者，他们参考生态韧性理论中多重均衡的思路，解释现实经济中各种集聚现象的内在机制^⑤。由此，经济韧性（REI）的研究逐步展开，在经济地理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频繁遭遇各类冲击，经济韧性进入宏观经济学增长与波动领域的研究视野。2008 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推动经济韧性研究开始成为热点^⑦。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对经济韧性研究的热度进一步提升^⑧。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韧性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经济韧性的概念和内涵也仍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形成公认的概念界定。哈森克、爱德华将经济韧性理解为经济系统抵御冲击扰动并维系自身结构和功能

① D. S. Mileti, *Disasters by Design a Reassessment of Natural Haz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Joseph Henry Press, 1999, p. 371.

② 董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③ C.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 Rev. Ecol. Syst.*, 1973.

④ 唐任伍、李楚翘：《中国经济韧性的现实表征、动态演化与决定因素》，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⑤ A. Reggiani and T. D. Graaff, “Nijkamp P.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 *Networks & Spatial Economics*, 2002, Vol. 2, No. 2, pp. 211–229; M. Fujita and F.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⑥ 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载《财贸经济》2019 年第 7 期。

⑦ 宗会明、张嘉敏、刘绘敏：《COVID-19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载《地理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⑧ 苏杭：《经济韧性问题研究进展》，载《经济学动态》2015 年第 8 期。

的能力，以及经济系统通过迅速、多样化的响应措施来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①。哈罗盖特将经济韧性定义为经济体降低冲击带来福利损失的能力，宏观层面上经济韧性取决于经济体限制冲击带来直接收入损失的能力（即时韧性），以及经济体快速重建和恢复的能力（动态韧性），微观层面上经济韧性受家庭损失分布、家庭平滑消费能力以及风险分担计划的影响^②。其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韧性分析的微观视角。波斯玛提出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认为区域经济韧性不仅包含应对短期危机的能力，还应考虑长期扰动以及恢复长期经济增长的能力^③。马丁和森利提出经济韧性是一个可以被视作包括四个维度的动态渐进过程，即暴露于冲击下的风险或脆弱性、面对冲击影响的抵抗力、经过调整保持核心功能运转的适应能力（或称为适应性重新定位）以及恢复力（即从冲击中恢复的程度和性质）^④。尽管不同学者对经济韧性的定义方式不同，但经济韧性的本质特征都指向经济系统应对冲击的能力，这种能力通常可以按照时间阶段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冲击过程中降低冲击影响的能力，一般被称为抵抗力；二是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一般被称为恢复力。国内学者徐圆、张林玲指出，经济韧性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遭受外部冲击时自身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源发生再配置，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区域的最大可行产出或就业上限因此改变，引导经济不一定恢复之前的状态，而是进入一条比冲击前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均衡发展路径，或者进入一条比冲击前更消极、更收缩的增长道路^⑤。

与经济韧性高度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脆弱性。布里古利奥是较早同时研究经济脆弱性和经济韧性的学者之一，认为二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受外部冲击影响的风险。他将经济脆弱性归因于影响一国遭受外来冲击的内在条件，如经济开放、出口集中和对相关国家战略性进口的依赖等，这些因素是结构性的，很难通过短期的政策而改变。相反，经济韧性是指经济体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直接

① R. Hassink,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Vol. 3, No. 1, pp. 45 - 58; H. Edward, "Economic Shock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Its Effects*, 2012, No. 4, pp. 23 - 35.

② S. Hallegatte, "Economic Resilienc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USA: World Bank Group, 2014, Vol. WPS6852.

③ R. Boschma,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 *Regional Studies*, 2015, Vol. 49, No. 5, pp. 733 - 751.

④ R. L. Martin and P. J. Sunley,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No. 15, pp. 1 - 42.

⑤ 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

受到政策的影响,那些旨在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高市场效率、改善治理和扩大社会发展的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的韧性^①。霍贺莱纳认为经济脆弱性是吸收灾害事件负面影响的经济或财政能力,例如对资产损失进行再融资并迅速恢复到先前计划的经济增长路径的能力^②。诺伊和扬森将经济脆弱性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遭遇冲击时所面临的风险,而将经济韧性定义为一个经济体从冲击影响中快速恢复的能力^③。其关于经济脆弱性的定义基本对应了哈森克、爱德华关于经济韧性定义中的抵抗能力,也基本对应了马丁和森利关于经济韧性定义中的前两个维度——脆弱性和抵抗力,而其关于韧性的定义则基本对应了哈森克、爱德华关于经济韧性定义中的恢复能力,以及马丁和森利关于经济韧性定义中的后两个维度——适应能力及从冲击中恢复的程度和性质。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经济脆弱性和经济韧性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中一类观点将二者视为一回事,只是表述方式相反,高脆弱性意味着低韧性,低脆弱性也就是高韧性,比如欧洲投资银行(EIB)^④、唐任伍和李楚翹等;第二类将经济体面对冲击的抵抗能力视为脆弱性,而将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视为韧性,比如诺伊和扬森、迪奥普^⑤等;第三类则将脆弱性纳于韧性的概念范畴之内,视为韧性的一个方面,比如哈森克、爱德华、马丁和森利等。本文将采纳第三类观点,将经济韧性视为包含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动态过程,并将脆弱性视为韧性的一个维度。因此,影响韧性的因素既包括经济结构,也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政府政策。

对经济韧性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指标法,通过建立经济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对经济体的经济韧性进行打分评估,以期发现经济体经济韧性所处的水平,识别经济韧性中的薄弱环节,以便更好地防范冲击。这种方法多用于对冲击的防范上,以及事后对冲击影响的评估上。被用到的经济指标一般包括产量、

① L. Briguglio,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In L. Briguglio and E. J. Kisanga, Eds.,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Small States*, Malta: Islands and Small States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ta, 2004.

② S. Hochrainer, "Assessing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Are There An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Vol. 24, No. 2, pp. 280-302.

③ I. Noy and R. Yonson,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A Survey of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Sustainability*, 2018, No. 10.

④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The EIB COVID-19 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An analysis of countries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 Aug 27, 2020. 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thematic/the_eib_covid-19_economic_vulnerability_index_en.pdf

⑤ Samba Diop, Simplice A. Asongu and Joseph Nnanna, "Covid-19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dexes: Global Evidence", In Research Africa Network (RAN) Working Papers, 2020, No. 70.

收入、就业、通胀、消费、支出、储蓄、公共财政、国际金融、贸易等。指标的选取基于相关的概念框架或早期实证文献中确定的重要指标，指标权重的分配通常采取简单算术平均，或者根据专家经验、主成分分析等确定^①。如 EIB 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经济脆弱性（韧性）指数，选取的指标包括医疗保健质量和人口年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旅游业占 GDP 比重、侨汇收入占 GDP 比重以及燃料、金属和矿石占 GDP 的比重、公共债务和银行风险。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创建了经济脆弱性指数 EVI，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给予援助或者贸易优惠待遇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诺伊等人建立了经济脆弱性和韧性指数，以衡量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风险，认为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风险特别高^②。迪奥普等人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途径，选取 7 个指标构建经济脆弱性指数，选取 9 个指标构建经济韧性指数，并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疫情冲击下的 150 个经济体的经济脆弱性和经济韧性进行衡量，结果显示，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脆弱性最高，欧洲的经济韧性最高^③。由于指标体系法在指标选择和权重分配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出现指标之间因果混淆倒置，其统计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易受质疑^④。

另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是比较冲击前后核心变量对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经济韧性程度^⑤。这种方法需要设置一个作为参考的基准状态，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采用去年同期水平值，一种是无冲击情况下的反事实预测值。因反事实预测值能更准确地衡量冲击带来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这一做法。常用的核心变量包括 GDP、贸易额、物价指数、就业、固定资产投资等。这一方法对经济韧性的衡量一般分为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方面，用核心变量在冲击期的变化来衡量经济体的抵抗力，用核心变量在冲击之后恢复期的变化来衡量经济体的恢复力。对这种方法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马丁，他选用就业数量为核心变量，构建了两个简单的指标来评估地区经济应对危机冲击的抵抗能力以及衰退

① I. Noy and R. Yonson,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A Survey of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② I. Noy, N. Doan, B. Ferrarini and D. Park, "Measuring the Economic Risk of COVID - 19", *CESifo Working Paper*, Jun 23, 2020. <https://ssrn.com/abstract=3633658>

③ Samba Diop, Simplice A. Asongu and Joseph Nnanna, "Covid - 19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dexes: Global Evidence".

④ 唐任伍、李楚翘：《中国经济韧性的现实表征、动态演化与决定因素》。

⑤ 同上。

后的恢复能力^①。该方法通过对比个体的经济运行状况与个体所在的区域整体的运行状况，以检验个体的经济运行分异^②。此后，马丁等对指标构建方法进行了改进，用就业量实际变化与预期变化之差和就业量预期变化的比值作为抵抗力与恢复力的测度，其中冲击期对应的是抵抗力的测度，而从经济触底开始的复苏期对应的是恢复力的测度^③。汉斯和戈茨用产出的实际水平与基于趋势的预期水平的偏差来计算受冲击影响产出的下降或冲击过后产出的恢复，将产出“反弹”和“下降”的比率用作“韧性”的衡量^④。

对经济韧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对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一问题与用指标法衡量经济韧性具有共通性，因为指标选取的原则之一就是最能够影响经济韧性的那些因素。但是因为研究视角和目的不同，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在用指标法衡量经济韧性的研究中对指标的选择是先验的，而在对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重点是考察因素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对经济韧性的测度基础之上（指标法或核心变量法），以获得经济韧性的代理变量，再实证检验影响一国或者一地区经济韧性的某个或者某几个重要因素。通常被关注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结构、产业多样化、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等。比如马丁等研究了经济结构对经济韧性的重要影响^⑤。里奥斯研究了生产结构、影响知识创造的相关因素对金融危机期间西班牙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⑥。卡伊内利、王鹏飞和李红波研究了产业结构关联性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⑦。徐圆和张林玲、高齐、陈丛波和叶阿忠、任俊帆、刘逸等分别检验了产业

① 其中，一个地区的抵抗力用该地区危机期间就业的下降与该区域所在的国家整体上就业的下降之比衡量。即抵抗力 $\beta_r = (\Delta E_r / E_r) / (\Delta E_n / E_n)$ ，其中 $\Delta E / E$ 表示就业的百分比变化。如果 $\beta_r > 1$ ，意味着该区域对冲击的抵抗力较低，反之，如果 $\beta_r < 1$ ，意味着该区域对冲击的抵抗力较高。恢复力用危机之后复苏时期地区就业的平均增长率衡量，数值越高，代表恢复力越好。

② R. Marti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Vol. 12, No. 1, pp. 1-32.

③ R. Martin, P. Sunley, B. Gardiner, et al., "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 *Regional Studies*, 2016, Vol. 50, No. 4, pp. 561-585.

④ Y. Hans and S. J. Goetz "Predict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US Counties from Industry Input-output Accou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USA, 5 April 2013.

⑤ R. Martin, P. Sunley, B. Gardiner, et al., "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

⑥ V. Ríos, L. Gianmoena, B. Irazoz,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Resilience in Spai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2017.

⑦ G. Cainelli, R. Ganau, M. Modica, "Industrial Relatedness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7, Vol. 98, No. 2; 王鹏飞、李红波：《基于产业结构关联视角的区域经济韧性作用机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载《地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2期。

结构多样化、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战略耦合对塑造地区经济韧性的作用^①。

本文借鉴上述对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将经济韧性定义为经济体抵御冲击影响的抵抗力和从冲击中恢复的恢复力，参考马丁等人对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识别塑造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的条件和因素，以期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 经济韧性的测度和衡量

目前距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经过去了两年，这期间随着管制措施的实施、疫苗的研发和接种，疫情一度受到遏制，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各国于2020年下半年相继放松疫情管制措施，投入到复工复产中。2020年第四季度第二轮疫情暴发，各国实施新一轮管制措施，随着2021年第一季度疫情形势的缓和，管制措施陆续解除，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经济进一步复苏。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国别报告，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经济率先于2021年第一季度恢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暴发之前的水平，斯洛文尼亚、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经济也都于2021年上半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克罗地亚经济于2021年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捷克、北马其顿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上半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鉴于旅游业是此次危机中受到冲击最严重、同时也是恢复最为缓慢的产业，以旅游业为主的黑山预计将到2023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21年底新冠肺炎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因其超强的传染性，推动全球新一轮疫情大流行，加之2022年初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加剧了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复苏之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新一轮疫情大流行，基于对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强但危害性较低判断，以及为了支持经济复苏，中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较为缓和的

^① 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高齐：《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22年第1期；陈丛波、叶阿忠：《数字经济、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载《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17期；任俊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载《市场周刊》2020年第7期；刘逸、纪捷韩、许汀汀等：《战略耦合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载《地理研究》2021年第12期。

应对措施，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完全放弃对疫情的管制措施。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东欧国家经济仍处在缓慢复苏的通道之中。因此，本文暂且将 2020 年视为中东欧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抵抗期，将 2021 年视为恢复期。由此，对应着经济韧性的两个方面：抵抗力和恢复力。

下面本文将采用核心变量法，选取 GDP 作为核心变量测度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东欧国家 GDP 的实际值与按照既定增长路径的反事实预测值（假定疫情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之差，除以既定增长路径下的反事实预测值，获得的比率可描述受疫情影响经济偏离既定增长轨道的程度，作为抵抗期经济韧性（抵抗力）的衡量指标。鉴于人们普遍将实际产出是否恢复到疫情冲击前的水平作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判断，本文也沿用这一标准，将疫情冲击前一年即 2019 年的实际产出作为恢复期的基准值，用以衡量恢复期的经济韧性（恢复力）。公式如下：

$$Resis = \frac{Y_t^c - \widehat{Y}_t^c}{\widehat{Y}_t^c} \times 100$$

$$Recov = \frac{Y_t^r - Y_0}{Y_0} \times 100$$

其中 *Resis* 代表抵抗期的经济韧性（抵抗力），数值越小，代表抵抗力越低，经济韧性越差，反之，则经济韧性越好；*Recov* 代表恢复期的经济韧性（恢复力），*Recov* > 0 代表经济体开始复苏，数值越高，代表恢复力越强，经济韧性越高。 Y_t^c 、 Y_t^r 分别代表抵抗期和恢复期的实际产出， \widehat{Y}_t^c 代表抵抗期实际产出的反事实预测值， Y_0 代表疫情冲击前的产出水平，即 2019 年各国实际产出。由此测得中东欧国家在疫情冲击下的经济韧性水平如下：

表 1 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指数

国家	抵抗力	恢复力
阿尔巴尼亚	-7.21	4.76
波黑	-5.57	2.50
保加利亚	-7.35	-0.39
克罗地亚	-10.52	1.50
捷克	-8.20	-2.73
爱沙尼亚	-5.69	5.15

匈牙利	-7.72	2.12
拉脱维亚	-6.38	0.73
立陶宛	-2.78	4.80
黑山	-17.34	-4.78
北马其顿	-9.16	-2.39
波兰	-5.46	2.98
罗马尼亚	-7.00	1.91
塞尔维亚	-4.75	6.37
斯洛伐克	-6.87	-1.47
斯洛文尼亚	-6.96	3.54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的数据计算得出。

由表 1 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无论在抵抗期还是恢复期的经济韧性指数相差都非常大。就抵抗期来看，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抵抗力最强的是立陶宛，其次是塞尔维亚、波兰，抵抗力最差的是黑山，其次是克罗地亚、北马其顿和捷克。就恢复期来看，除了保加利亚、捷克、黑山、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五国尚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之外，其他几个中东欧国家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就恢复程度而言，塞尔维亚的复苏最为强劲，其次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阿尔巴尼亚，黑山的恢复力最差，其次是捷克、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

参考布里古利奥、迪奥普等人的做法，对中东欧国家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进行交叉分析^①。以中东欧国家抵抗力和恢复力的上 70% 分位数和下 30% 分位数值为分界线，将 16 个中东欧国家分别划分为七种情景：高抵抗力—高恢复力、中抵抗力—高恢复力、高抵抗力—中恢复力、中抵抗力—低恢复力、低抵抗力—中恢复力、中抵抗力—中恢复力和低抵抗力—低恢复力。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特征，分别以最优、次优、较差、最差来表征上述情景。其中最优对应的是高抵抗力—高恢复力情景；次优对应的是中抵抗力—高恢复力、高抵抗力—中恢

^① L. Briguglio, "The Vulnerability Index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 Review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IMS Regional Preparatory Meeting on the Ten - Year Review of the Barbados Programme of Action, September 1 - 5 2003, Praia, Cape Verde; L. Briguglio and G. Cordina; N. Farrugia and Vella S.,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Vol. 37, No. 3, pp. 229 - 247; Samba Diop, Simplicie A. Asongu and Joseph Nnanna, "Covid - 19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dexes: Global Evidence".

复力和中抵抗力—中恢复力情景；较差对应的是中抵抗力—低恢复力和低抵抗力—中恢复力情景；最差对应的是低抵抗力—低恢复力情景。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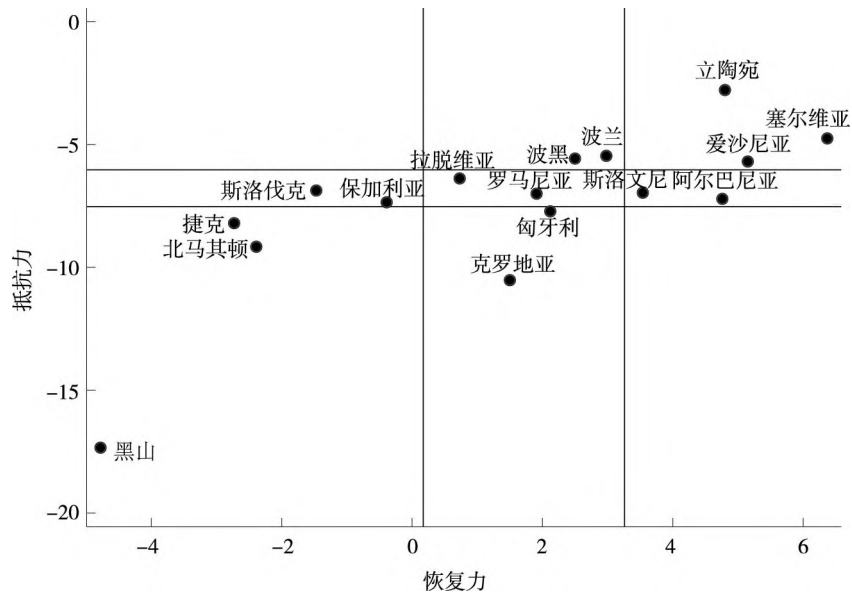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

立陶宛、塞尔维亚、爱沙尼亚表现最优，隶属于高抵抗力—高恢复力情景，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程度有限，率先从冲击中复苏且复苏强劲，表现出最强的经济韧性。

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波黑、拉脱维亚、罗马尼亚表现次优，其中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属于中抵抗力—高恢复力情景，这两个国家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较大的冲击，体现出较高的经济脆弱性，但鉴于这两个国家拥有较强的恢复力，在冲击过后能快速、较大程度上恢复到冲击之前的水平，因而疫情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波兰和波黑属于高抵抗力—中恢复力情景，这两个国家尽管受到疫情冲击的程度相对较小，但是复苏相对乏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属于中抵抗力—中恢复力情景。这两个国家对疫情冲击的抵抗能力与从冲击中复苏的程度和能力在中东欧国家中都属于中等水平。

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经济韧性表现较差。其中匈牙利、克罗地亚属于低抵抗力—中恢复力情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属于中抵抗力—低恢

复力情景，这几个国家对疫情冲击的抵抗力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在中东欧国家中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

捷克、北马其顿、黑山表现最差，属于低抵抗力—低恢复力情景。这几个国家无法有效抵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难以快速地从冲击中复苏，经济韧性水平最低，其中又以黑山的经济最不具有韧性。

三 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分析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中东欧国家面对疫情冲击表现出更高的经济韧性？或者说，在疫情冲击下，影响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依据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和疫情影响经济的机理，建立分析框架，找出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变量，并进行实证检验。

（一）分析框架与变量选择

布里古利奥在对经济脆弱性和经济韧性的概念辨析中，将经济脆弱性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而将经济韧性归因于政策性因素^①。鉴于本文所研究的经济韧性是一个包含经济脆弱性概念在内的广义概念，受上述观点启发，可以从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两方面，选取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变量。

1. 结构性因素

如前文所述，学者们从不同案例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产业关联性、产业结构多样化等对经济韧性的作用。这些研究一般建立在经济专业化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到底是好是坏这一基本争论上^②。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产业结构的整体情况，而不会突出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配置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事实上，冲击的类型不同，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方式也会差异很大。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健康卫生领域的外生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渠道既有直接地也有间接地。正因如此，尽管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受到了冲击，但不同产业受冲击的程度差异很大。公认的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最严重的产业是旅游业，因为旅游业属于面对面服务业，所以那

^① L. Briguglio,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② R. Martin, P. Sunley, B. Gardiner, et al., “How Regions React to Recessions: Resilience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

些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将暴露更大的脆弱性。

而受到疫情间接影响最大的是数字经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了需求结构,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由于保持社交距离是抗击疫情的重要策略,居家办公、视频会议、远程教学、网络购物等成为疫情时期维持生产生活和学习的重要方式,由此引致对数字经济的高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有较好的数字经济基础的国家来说,将更有利于疫情期间维持生产生活活动,更能抵御疫情的冲击。

受疫情间接影响的还有外向型产业。为抗击疫情,许多国家都采取“封城”、“封国”等措施,同时还面临外贸需求的萎缩,这使得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外向型产业既无法获得原材料、半成品等进口商品以完成日常生产活动,也无法有效将产品销售运输出去。因而,那些出口导向、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面临较大的产业链、运输链和外需风险。

2. 政策性因素

与疫情相关的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为限制疫情大流行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包括封锁、工作场所关闭、旅行和餐饮禁令等管制措施,以及病毒检测、接触者追踪、疫苗接种等卫生措施,而对经济影响大的主要是管制措施。政府在降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有效抗击疫情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以抗击疫情、维护生命健康为第一目标,政府会倾向于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抗疫措施,但由此带来的是生产活动急剧收缩、经济大幅下滑的代价;如果为了尽量降低经济的不利影响而选择较为宽松的抗疫措施,又会延长疫情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甚至有可能导致疫情失控,对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而不得不转向严格的抗疫措施。可见,基于不同的初衷,各国之间抗疫措施的方向、范围和严格程度相差很大。

二是为降低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帮助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尽快恢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税收和社保基金减免、扩大政府采购、工资补贴、福利救助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降低利率、扩大货币发行量、放松信贷标准等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方面,一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受执政者执政理念的影响。例如鹰派的央行行长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政策立场,而鸽派更为温和,采取更为柔和的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两派的政策立场会相对不那么分明,均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但在政策实施的程度、时间长短等方面会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财政和货币

政策很大程度上受财政货币制度的制约。欧元区成员国、采用欧元为国家法定货币的黑山和实施货币局制度的国家波黑在货币政策方面空间非常有限。欧元区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货币政策统一于欧洲央行框架下。此外，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同本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政府公共债务水平等因素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选取四个结构性指标，分别是旅游业占 GDP 比重、数字经济竞争力、全球产业链参与程度和经济复杂性；两个政策性指标，分别是抗疫措施的严格程度、支持性经济政策，作为待检验经济韧性的核心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16 个中东欧国家，由于北马其顿和黑山两国数据有较大缺失，该部分最终只保留 14 个案例国家，分别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可比性等方面的考虑，分析期间为 2020 年，即侧重分析影响中东欧国家面对疫情冲击抵抗力的决定因素。本文拟选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进行实证。定性比较方法（QCA）是 1987 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率先提出的，此后历经多位学者的研究和改进，目前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卫生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方法，一是考虑到样本数据的特点。对于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来说，本文的样本容量偏小，而对于定性分析来说，样本容量又有点偏大。而定性比较分析的适用样本容量为 10 ~ 100，恰好适用于本文的样本。第二，定性分析一般集中于分析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难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也难以进行案例之间的系统性比较。定量分析可以分析大样本案例，并进行样本之间的系统性比较，但是却不能得到单个样本的具体信息，而且在因果分析中只能得到每个条件的净效应，不能分析条件之间的组合效应，有时候无法与现实贴合。比较定性分析则处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之间，可以规避二者的弊端。相比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分析，比较定性分析更加客观，而且可以处理更大的样本；相比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分析，比较定性分析可以清晰地体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复杂性、对不同国家影响的异质性、基础条件以及应对方式的多样化，塑造经济韧性的每个理论条件（影响因素）的作用都不应该孤立地考虑。相反，这些条件和因素应该被视为国家“概况”的基本组成部分，各个方

面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也不应被忽视^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定性比较分析也更加切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三）数据及校准

1. 结果变量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使得中东欧国家经济具有韧性的前因条件是什么？不具有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是什么？因而经济韧性是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和因变量，数据来源于本文根据核心变量法测得的经济韧性指标值。

2. 条件变量

根据上文的分析，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条件变量：

旅游业占 GDP 比重（TT）：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②。

数字经济竞争力（DIGI）：数据来源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019 年数字竞争力排名》^③，参与该报告排名的都是数字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经济体，阿尔巴尼亚、波黑和塞尔维亚没有纳入到排名中，鉴于这三个国家数字经济尚没有起步或刚开始起步，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而本研究采用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建立在集合概念基础上，在此将这几个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数据设置为零，意味着这几个国家都在具有数字经济竞争力的集合之外，是合理的。

参与全球产业链程度（INT）：以中间品贸易占 GDP 比重衡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 Comtrade）基于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分类标准的贸易数据计算得到。

经济复杂性程度（ECI）：来源于哈佛增长实验室的经济复杂度指数（ECI）^④，该指数越高，意味着经济多样化程度和产业技术水平越高。

① Samba Diop, Simplice A. Asongu and Joseph Nnanna, "Covid - 19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dexes: Global Evidence".

② "The 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September 4, 2021. <http://reports.weforum.org/travel-and-tourism-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

③ "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1", September, 2021. <https://www.imd.org/centers/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digital-competitiveness/>

④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https://atlas.cid.harvard.edu/>

抗疫措施的严格程度（GSTR）：根据牛津大学制定的指数来衡量^①，该指数系统地跟踪了各国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采取的广泛政策，取值从0~100，数值越大代表措施越严格。

支持性经济政策（BUD）：以预算平衡（报告期内政府预算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预算盈余或赤字）占GDP比重来衡量，政府预算缓冲空间越大，在疫情期间越有能力提供支持性政策。数据来源于EIU国家数据库。

3. 数据校准

FsQCA要求使用有意义的阈值将原始值校准为模糊集。通过这种方式，每个样本（案例）都被分配一个分数（范围从0到1），以表示其在集合中的隶属程度。对于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两个锚点的选择，本文参照既有的研究方法，分别选择样本数据的95%和5%分位数。各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描述与锚点的确定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分析。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校准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INT	0.56	0.20	0.14	0.88	0.85	0.51	0.27
ECI	0.55	0.30	0	0.97	1.69	0.89	0.19
TT	0.46	0.28	0.03	0.97	9.54	2.75	1.70
DIGI	45.28	24.53	0.00	70.04	67.15	53.41	0.00
GSTR	50.95	5.06	39.65	58.72	57.24	51.99	42.83
BUD	-0.62	1.50	-4.56	1.97	1.00	-0.39	-2.96
Resis	-6.60	1.73	-10.52	-2.78	-4.06	-6.92	-9.01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1. 必要性分析

按照惯例，首先需要逐一对各个条件的“必要性”进行单独检验，分析这些条件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经济韧性或者不具有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应用0.9的一致性阈值和0.6的覆盖度阈值标准。如表3的必要条件分析结

^① T. Hale, S. Webster, A. Petherick, T. Phillips and B. Kira, “Oxford COVID - 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vid-19-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果显示，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同时超过这两个阈值。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自身能成为具有经济韧性或者不具有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经济韧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换言之，使经济具有韧性或者不具有韧性，需要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的协同作用。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具有经济韧性			不具有经济韧性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旅游业占比高	0.552	0.651	旅游业占比高	0.752	0.757
旅游业占比低	0.793	0.789	旅游业占比低	0.653	0.555
参与产业链程度高	0.623	0.625	参与产业链程度高	0.709	0.608
参与产业链程度低	0.609	0.710	参与产业链程度低	0.563	0.560
数字竞争力高	0.727	0.720	数字竞争力高	0.707	0.598
数字竞争力低	0.593	0.703	数字竞争力低	0.668	0.677
经济复杂性高	0.608	0.595	经济复杂性高	0.743	0.621
经济复杂性低	0.613	0.736	经济复杂性低	0.516	0.529
预算盈余高（或赤字低）	0.713	0.726	预算盈余高（或赤字低）	0.631	0.549
预算盈余低（或赤字高）	0.558	0.639	预算盈余低（或赤字高）	0.685	0.671
抗疫措施严格	0.588	0.631	抗疫措施严格	0.671	0.615
抗疫措施不严格	0.641	0.695	抗疫措施不严格	0.597	0.553

2. 充分性分析（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采取拉金和菲斯所提出的 QCA 分析结果呈现形式^①。该呈现形式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地表明各个条件在组态中的相对重要性^②。其中，●表示该条件出现，⊗表示该条件不出现，大●和⊗表示该条件为“核心条件”；小●和⊗则表示该条件为“边缘条件”；空格则意味着条件变量的存在对于结果而言无关紧要。

^① C. C. Ragin, and P. C. Fiss,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in C. C. Ragin, ed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190–212.

^② 谭海波：《技术管理能力、注意力分配与地方政府网站建设——一项基于 TOE 框架的组态分析》，载《管理世界》2019 年第 9 期。

表 3 经济韧性的充分条件组态分析

组态	解			
	1	2	3	4
TT	⊗	⊗	⊗	⊗
INT	⊗	⊗		
DIGI			●	●
ECI		●		●
BUD	●		●	
GSTR			⊗	⊗
一致性	0.993651	0.910663	0.885093	0.885093
原始覆盖度	0.414569	0.418543	0.377483	0.337748
净覆盖度	0.0503312	0.0860927	0.0490066	0.0410596
典型案例	塞尔维亚 (0.53, 0.91)	罗马尼亚 (0.76, 0.47), 波兰 (0.65, 0.82)	立陶宛 (0.75, 0.99)	斯洛伐克 (0.51, 0.51)
解的覆盖度	0.662252			
解的一致性	0.883392			

表 3 呈现了用以解释高经济韧性的四条驱动路径。其中，每一纵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解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为 0.88，这意味着，在所有满足这 4 类条件组态的中东欧案例国家中，有 88% 的国家呈现较高的经济韧性水平。解的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为 0.66，这意味着，四类条件组态可以解释 66% 的高经济韧性案例。

基于条件组态，我们可以进一步识别出结构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在塑造中东欧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韧性的差异化配置。

具体来说，条件组态 1 表明，当一国旅游业占比很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很小，同时政府此前一直实施较为审慎的财政支出计划，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低甚至略有盈余，因而面临疫情冲击政府有较多的空间进行支持性经济政策时，无论其他几个条件发生与否，都能在疫情冲击中体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其中，旅游业占比低和参与全球产业链程度小是核心条件，预算平衡占 GDP 比重高为边缘条件 (或称补充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约 41% 的高经济韧性案例。另

外，约 5% 的案例国家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典型的案例国家是塞尔维亚。

条件组态 2 表明，当一国旅游业占比很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很小，但是经济结构多样化且产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时，无论其他条件发生与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都能体现出较好的经济韧性。其中，旅游业占比低、参与全球产业链程度低、经济复杂性指数高均是边缘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约 41% 的高经济韧性案例，约 8% 的案例国家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典型的案例国家是波兰和罗马尼亚。

条件组态 3 表明，一国旅游业占比低，拥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同时在疫情爆发前政府一直持财政审慎态度，预算赤字占 GDP 比重较低甚至略有盈余，并且不实施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无论其他条件发生与否，都可以在疫情冲击中体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其中，旅游业占比低，以及不实施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是核心条件，预算平衡占比高以及数字经济竞争力强是边缘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约 38% 的案例，约 5% 的案例国家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典型的案例国家是立陶宛。

条件组态 4 表明，当一国旅游业占比低，数字经济竞争力强，产业多元化且其产业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同时不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则不论其他条件发生与否，都可以在疫情冲击中体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其中，旅游业占比低，以及不实施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是核心条件，数字经济竞争力强以及经济复杂性指数高是边缘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约 34% 的案例，约 4% 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典型的案例国家是斯洛伐克。

表 4 缺乏经济韧性的充分条件组态分析

组态	解	
	1	2
TT	●	●
INT	●	●
DIGI		
ECI		⊗
BUD		⊗
GSTR	●	
一致性	0.885813	0.863158
原始覆盖度	0.396899	0.254264

净覆盖度	0.260465	0.117829
典型案例	斯洛文尼亚 (0.57, 0.51)	保加利亚 (0.54, 0.65)
解的覆盖度	0.514729	
解的一致性	0.902174	

表4呈现了与缺乏经济韧性相关的两种不同的配置，这些配置与表3中的配置并不是镜像关系，也就是说，与使经济具有韧性的条件组合相反的那些配置，并不必然会带来经济韧性的缺失。然而，旅游业占比高以及参与全球生产链的程度高，确实使得经济体高度暴露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体现了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而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低、疫情前已经有较高的财政赤字以及为抗击疫情采取的严格管制措施，确实会加重原本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也阻碍了复苏之路。

结论与启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东欧国家表现出了差异显著的经济韧性。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塞尔维亚三国最具经济韧性。基于各自不同的基础和条件，这几个国家经济较好抵制了疫情的冲击，偏离既定经济增长轨道的程度较小，体现出较高的抵抗力；疫情缓和之后又以较快的速度、较高的程度恢复到疫情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出较高的恢复力。波黑和波兰受疫情冲击偏离经济既定轨道的程度较低，抵抗力较高，但恢复速度和程度在中东欧国家中居中。与之相反，斯洛文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两国经济偏离既定轨道的程度居中，但恢复力较高，而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经济偏离既定轨道的程度以及恢复的程度在中东欧国家中都居中，这几个国家的经济韧性仅次于立陶宛等三国。相对而言，捷克、北马其顿和黑山的经济韧性最差。这几个国家不仅在疫情冲击下较大程度地偏离了既定增长轨道，表现出较高的脆弱性，而且复苏缓慢，复苏程度低，因而无论是抵抗力还是恢复力都是中东欧国家最低的，其中又以黑山的表现最差。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经济韧性水平处于中下位置。

对塑造经济韧性前因条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显示，有四条路径使得中东欧国家面对疫情冲击时具有经济韧性，分别是：(1) 旅游业占比低、参与全球生产链程度低，并且在疫情冲击前拥有较高的财政缓冲（预算赤字占比低甚至略有盈余），代表性案例国家是塞尔维亚；(2) 旅游业占比低、参与全球

生产链程度低、经济复杂性高，代表性案例国家是波兰和罗马尼亚；（3）旅游业占比低、数字经济竞争力强、财政缓冲高以及抗疫措施不严格，代表性案例国家是立陶宛；（4）旅游业占比低、数字经济竞争力强、经济复杂性高以及抗疫措施不严格，代表性案例国家是斯洛伐克。上述结果显示，塑造经济韧性的路径是多样化的，但任何一条路径都离不开结构性因素，说明经济结构是关系经济是否具有韧性的根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来说，不过多依赖旅游业是各条路径共同的前因条件。此外，较高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较高的技术水平、不过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都是塑造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而较高的财政缓冲也有助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提高经济的韧性。

本文从中东欧这些中小国家出发，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种健康卫生领域的冲击出发，补充和丰富了当前有关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小国区域视角和卫生冲击视角，印证了产业结构对一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性。此外，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欧洲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韧性影响的启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韧性的测度显示，经济韧性最高的国家中既有欧盟成员国也有非成员国，同样，经济韧性最差的国家也不都是非欧盟成员国，加入欧盟，或者说欧洲一体化并不是成员国获得经济韧性或者丧失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但是，欧洲一体化确实会引起成员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变化，特别是会促使成员国生产的专业化，而生产的专业化会增加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来自欧盟的资金支持则会降低外部冲击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有助于增强经济的韧性。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在按照比较优势融入欧洲生产链，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以何种程度和方式融入，能够既享受到比较优势的利得，提高经济福利水平，同时又能不过多损害经济多样化和复杂性，保持经济韧性和长远发展能力。此次疫情凸显了数字经济对于提高经济韧性的重要意义，推动数字化转型也是当前欧盟委员会的施政重点。对于中东欧成员国来说，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塑造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不仅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也有助于降低生产的专业化对经济韧性的不利影响。

（责任编辑 于树一）

enable them to constantly measure their own benefits and risks, and Russia will need the support of the Union more than ever.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western sanctions, the risk of a complete sepa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from energy trade to financial investment has risen sharply.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may move towards a closed system in the future, and its prospect is not optimistic.

Key Word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Trade Intensity,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19: Performance, Causes and Enlightenment Wang Xiaoyun

The paths for shaping economic resilience are diversified, but none of them can be separated from structural factors. Fo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there are four strengthening paths, of which not relying too much on tourism is the common antecedent condition of all paths. In addition, higher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versified economic structure, higher technology level, and not excessive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re all key factors in shaping economic resilience. A higher fiscal buffer will also help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the economy. This paper uses the core variable method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16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acing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On this basi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issues related to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 mechanisms and channels of the COVID – 19 epidemic impacting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six possible antecedent conditional variable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are selected, and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shap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Resilienc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VID – 19 Epidemic,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